

【书 评】

余英时著《余英时回忆录》

台北: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, 2018

ISBN: 978-986967773-8, 232 页

叶金辉¹

马来西亚华社教研机构

1995 年台湾正中书局推出“当代学人学思历程”系列丛书, 余英时被列为作者之一, 备受期待, 但终究未见出版。此前, 他的其他回忆文章、访谈录可与《余英时回忆录》(以下简称《余》, 引用只注页码)对照合观。

本书围绕作者自少年辍学、勤学、燕京大学、香港新亚书院到哈佛大学的亲历所闻, 侧重记叙思想成长与转折点。他少时受胡适自由主义熏陶, 可是也坦言一度在北京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, 感染了宗教式的狂热情绪、左倾幼稚病, 以盲目的道德高度驳斥一位同乡牧师, 以致六十年后仍深感“愧悔”、“无地自容”(页 89)。1950 年他南下香港与家人相聚, 多番踌躇后决心返回北京, 但一念之间思及应尽孝道, 最后留在香港。此中关键时刻的偶然抉择, 牵引出家国与个人命运临界点的时代张力与历史震撼。

新亚念书期间, 余英时参与《自由阵线》等香港右派杂志的编辑工作, 对思想转型垫下基础。为了顺从双亲的意愿, 作者于

1 叶金辉, 马来西亚(新加坡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)助理秘书。

1962年申请入籍美国。其父余协中于同年任南洋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，²翌年离职，极可能是随子成功申请移居美国。下述拟就为学与为士之道，牵引出与作者相关的事迹，作为延伸述评、对话与补充。

一、为学之道

《余》不离作者的治学风格，不时佐以人物口述、文章与史料文献互证，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以真实的面貌。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三代知识人，以时代骤变下流散海外的心路历程折射中国现代文化、学术与思想史变化的时空维度，边叙边议，笔调不愠不火，富含感情。

综观作者的著作，从先秦到当代，对多个大朝代都留下掷地有声的专题研究，做到“通古今之变”。他也善于钩沉、考证人物思想、行谊，夹杂辩诬或翻案，诸如方以智、戴东原等，打通经、史、子门，并旁涉文学（《红楼梦》、《柳如是别传》等）。治学方法上，承继钱穆与杨联升之精髓，义理与实证、统合与研析并重，辅以考古发现，置议题于历史脉络下或东西比较，见树又见林。下笔严谨，线性至体面运思缜密，融会贯通。文采、深度、卓见齐现，才、学、识兼具；就连许倬云也尝赞余英时治学“了不起”、“会捉题目，文章做得细致，写得滴水不漏”。³

举《历史与思想》为例，从1976年初版至2014年（2016年新版），卅八年间创下学术著作翻印二十余次的长销记录，几乎成了

2 “南洋大学史料汇编”编委会：《南洋大学史料汇编》，吉隆坡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，1990，第178页。

3 许倬云口述，李怀宇撰写：《许倬云谈话录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0，第225页。

港台高校历史系必读物，影响两三代人。这是因为作者凭着锐利的眼光立论，在题旨的骨节处游刃，开启历史新视野，篇篇经典，可读性与论析力极强。该书提出的“反智论”、“外儒内法”、“道尊于势”、“主智主义”等，观点历久弥新，甚至可观照现实政治。

广而言之，余英时的思想史研究已上升为“知识社会学”（知识阶层与社会经济），甚至为中国史学开一新面，即由“社会哲学”、“文化哲学”关怀下涉入“传统的现代诠释”。⁴深厚的功底无形中为自己树立公认的学术地位，成为蜚声国际的史学家、知识人，华人世界人文学界的“祭酒”。在中国文化史上，他被奉为继清末梁启超、民国胡适、新中国郭沫若后，近二十年的“中心人物”，⁵堪称一代史学大家。是以，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，就连李远哲聘请张光直出任中研院副院长前，也致电向他征询意见（页 221-222）。

《余》最后不忘梳理中国人文学者在哈佛的三阶段历史发展，但略嫌过于简略。其中，引用了吴宓、赵元任、周一良等人的回忆文章。可惜，作者遗漏参考一本供参照互见的重要书籍，亦即周棉主编的《中国留学生大辞典》⁶。它记录中国留学生就读的大学、院系、年份、所获学位等，可补充个别回忆文章的完整性与系统性。

余英时可能是最早致力于梳理现代知识分子研究、中国现代知识群体互动与活动的学者。90年代中期，思想史学者许纪霖开始投入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网络，并于2004年前后成功向当局争取纳为学生的博论主题范围，聚焦30年代上海知识分

4 江日新：〈历史与思想及之外——余英时院士的学术成就〉，《中国文哲研究通讯》，1992年第2卷第1期，第81-82页。

5 胡文辉：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0，第182页。

6 周棉：《中国留学生大辞典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。

子的交往、日常生活、阶层的形成、精神生活建构等。⁷余英时可说是这研究范畴的先行与开拓者。

二、为士之道

余英时并非在象牙塔内坐而论道之文人，而是脱出传统“学而优则仕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，以士代仕，透过论文衡史、补苴罅漏介入政治文化改革与进行社会启蒙。为此，他写了多篇论文化危机、儒学现代诠释、知识分子、民主方向、资本主义、两岸动向等人文关怀的评论文章，履行知识人的责任与角色。

胡适是余英时高度推崇的知识人，精神上追随前者。蒋介石屡次诚邀胡适出任高官要职，但均遭回拒，后者宁可保持“独立超然”的距离，当政府的“诤友”。⁸我们没有必要圣化谁人，但余英时确曾批评国民党，设使他识时务而转态献媚权贵、入党求官，此后当可仕途青云。所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不过是效法胡适当政府的“诤友”。

具有成为注脚价值的事实是，1994年，意欲巩固政治权威的李光耀提出“亚洲价值观”，招致余英时暗讽为“吾祖先之不肖子孙”。⁹知识人直面强权、不平则鸣的气节，可见一斑。

7 见许纪霖：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：1895-1949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8。其博士生未出版的论文有郑志峰：《重建社会重心：战后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研究（1945-1949）》，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论文，2008年，等；已出版的博论有胡悦晗：《生活的逻辑：城市日常世界中民国知识人（1927-1937）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8；等等。

8 胡适：《胡适全集》，第32卷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，第168页，第171-173页；胡适：《胡适全集》，第33卷，第627页；胡适：《胡适全集》，第24卷，第145页。

9 余英时：〈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——《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》序言〉，《现代学人与学术》，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，第91页。

了解到共产地下党员的表兄汪志天、因正直而左倾的学者翁独健、仗势凌人的翦伯赞的下场，余英时都不忍责备。虽然受过唐君毅的委屈，《余》不但只字未提，而且执师道，对前者的成就赞誉有加。李约瑟坚认中国本土思想只有“此世”而无“彼世”（页198），作者对此误识点到即止。作者也体谅张光直的处境，并检讨自己当时情绪过分波动，冷静分析后，终归平息（页223-224）。汪荣祖与李敖分别于1984年与1986年讥刺余英时诠释陈寅恪的著作暗码，一年后余英时透露陈寅恪托弟子李玉梅带话转告“作者知我”。¹⁰ 这些学思“战绩”本可顺带总结，但作者志不在逞才使气，故《余》内不再重提。此种“同情之理解”、以理服人、尊重异见的胸襟与厚道，应该承自钱穆与胡适。如许笔墨官司与论难究学中，凸显了余英时的考释工夫，过人的判断与洞察力更胜一筹。

相比之下，刘述先的学思自传《传统与现代的探索》（台北：正中书局，1994）充满自负，自视甚高，也毫不讳言直数唐君毅的不是。何炳棣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（香港：商务印书馆，2012）更是傲气十足，对哈佛学人积存怨恨与对立的“瑜亮情结”。除却才学，学养也许是造就大家的前提，如果学人缺乏风范，不谦恭自省，无宽容的胸怀，即无以成为大家。余英时继承钱穆、胡适与五四精神，后来担任“胡适讲座访问教授”、“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”，可谓实至名归。

基于国际学术声望、不畏强权地伸张正义，他在知识社群中建立了跨界知识人的崇高地位。《余》入选“《亚洲周刊》2018年十大好书”（第四名）与第43届金鼎奖。《印刻文学生活志》第

10 余英时：〈书成自述〉，《陈寅恪晚年诗文集释证》增订新版，台北：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，1998，第6页。

182期(2018年)也以余英时肖像作为封面专辑,并独家连载《余》部分篇章、其门生友侪的回忆文章。史家的学思回忆录被视为传记文学,在纯文学刊物上连载,实为罕见。

或许余英时没有料到,他的成就与风骨也被马来西亚一群青年学者所私淑与神往,滋养与“师承”两三代学人,“学统”隔海传扬。何启良亲手篆刻余英时为华社研究中心题写的牌匾,崇敬之情表露无遗。何国忠因慕名而立意负笈普林斯顿大学拜师求学(后因故未成),追读每一本余英时的著作,以胡适为研究对象。何国忠之学生黄文斌在教学上多采余英时的论点,并以钱穆为博论研究主题。他们的不少同辈与学生也受到思想的散播,对余英时敬仰备至,也因而专攻思想史。

结语

以学思为中心的《余》足以启迪后进,留下珍贵的治学智慧与史料轶事,是值得鼓励与期待的文体,起码该书达到了此旨趣。1960年代始,余英时确立了现代中文人文学术研究的典范,让中国思想史学研究在美国开花。从他的为学与为士之道,彰显其修学与养性一体不二。他的名句:“我在哪里,中国就在哪里”,乃“内在超越”与自由精神的升华,治学与立命的合一境界;吾辈“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”。